

# 反思与展望

“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联合讲座”报告选(续)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编著  
北京青年经济学会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2 020 4138 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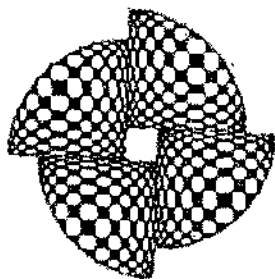
# 反思与展望

“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联合讲座”报告选(续)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

北京青年经济学会

编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

责任编辑：傅 强

封面设计：邱云松

技术设计：盛寄萍

## 反思与展望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编 著  
北京青年经济学会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mm 1/32 印张6.625 插页4 字数150千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20-00297-1/F·15

印数：1-1180 册

定价：1.85 元



## 序

作为第3期“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联合讲座”的成果，现在和大家见面了。值得称道的是，近几年来，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化，不仅给广大理论工作者提出崭新课题，也愈益成为全国群众关心和议论的“热点”。这既反映出全国人民对改革的关注和期望，也说明对前一段改革的回顾总结已迫在眉睫。

1987年2月初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，要回顾、总结几年的改革，研究今后改革的思路。全国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探讨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这本集子随之应运而生。撰稿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们用深入浅出的经济理论和翔实的数据，分别从不同侧面、各种角度分析了近年来的经济形势和改革状况，析理透彻，见解独到，读来使人豁然开朗，疑云顿释。

究竟如何评价几年来的改革呢？要在理论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中间确立一种共同语言，就必须首先排除细枝末节，把评价标准统一在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基点上。众所周知，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变化，使我们的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活力，市

场商品从未像现在这样丰富，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更为过去所望尘莫及。1952—1978年，我国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加84亿元，而1979—1986年平均每年增加315亿元。与此同时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更是有目共睹。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1978年仅134元，1986年达到424元；同期，职工的人均年收入由644元直线上升到1332元；城乡居民的储蓄余额也由120亿元猛增到现在的2237亿元。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得到实惠。人心思变，拥护改革，已成大势所趋。

中国有句老话：好事多磨。我们的改革前无古人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更是前所未有。新旧体制在交替中，出现一种既非此又非彼的特殊形态，不仅这成改革的难度，而且容易激化一些潜在的固有矛盾。财政、货币情况有些捉摸不定，市场透明度不很清晰。物价的严重扭曲亟待改变，但因涉及到千家万户又需审慎从事。凡此种种，矛盾交错，头绪纷繁。而解决这些矛盾，推进改革深化，正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。

总之，对改革的情况可用16字加以概括：“方向正确，成绩很大，经验颇多，问题不少”。究竟问题的性质是什么？还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呢？我们在回顾总结中，不仅要肯定成绩和找出问题，而且要分析改革的复杂性并确定今后改革的思路，从而提出明年的改革方案。为此，就必须从实际出发，根据我国国情针对建设与改革中的问题对症下药，有的放矢。同时，必须抓住重点，突出关键性的问题，避免就事论事和泛泛而论。对一些举足轻重的关键性问题，要从更高的层次作历史的、科学的、综合性的分析研究。例如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，到底怎样摆，适度点在哪里，哪一种办法更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等。

这本集子的立意正在于此。向后回顾，向前探索，投石问路，抛砖引玉，相信会对大家有所裨益。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     李 峻



# 目 录

序	李 峻
改革的反思与展望	徐景安 1
改革中的国民经济形势分析	程晓农 20
历史性的转折与希望	华 生、何家成等 33
信用扩张与投资需求不足	
—1986年经济形势分析	张学军、张荣刚 46
分析当前经济形势，思考今后改革的路子	李剑阁 58
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分析	张少杰 69
企业发展与改革的选择	姚广海 77
1986年财政形势分析	贾 康 92
1986年物价分析报告	常 清、黄晓明 109
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	李 军、唐 俊 123
对近年来商业体制改革的反思	赵尔烈 137
1986年农村经济形势分析	陈锡文、高小蒙 151

不发达经济的发展与我国不发达地区	曹远征 164
关于苏联的经济改革	李峻 174
国防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发展	
——规划—计划—预算系统 (PPBS) 介绍	郑开昭 185
注重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调查研究	
	白南风 王小孩 杨晓 197





# 改革的反思与展望

徐景安

## 一、八年改革的基本成就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。城市改革，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，扩展到各个经济领域。工业扩展到商业、建筑业、交通运输业；分配领域、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；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的改革，扩展到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。

经过8年改革，我国经济体制的大格局发生了变化：

第一，随着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革，初步形成了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微观基础。家庭承包替代了生产队的集中劳动、集中分配，重新构造了农村的经济细胞。城市企业改变了统收统支，将职工利益和企业经营成果挂钩，具有了追逐利润的冲动和应变市场的动力。在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同时，集体经济、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有了很大发展。1985年与1987年相比，工业总产值中，全民所有制经济从占80%下降到70%；集体经济从不到20%上升到28%；个体和其他经济形式基

本上从无到有，达到2%。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，集体（包括供销社）和个体约占60%。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，使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从大锅饭中开始分离出来，微观机理的这一深刻变化，是商品经济发育的基础。

第二，随着生产、流通领域的指令性计划和统一定价范围的缩小，开拓和扩展了商品市场。到1986年底，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已从120种减到60种，国家统配物资从56种减到26种。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，农副产品已占65%。工业消费品占55%，生产资料占40%。商品市场的发展，为市场机制的运行创造了必要条件。

第三，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，财政主导型经济开始向信用主导型经济过渡。经过这几年改革，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，企业留利增加，预算外收入扩大，财政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，从1978年的35%下降到1986年的26%。目前，银行已成为筹集和分配社会资金的主渠道。银行所占份额已由1978年的23.4%上升到1986年的68.4%，财政所占份额由76.6%降为31.6%。金融已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。

第四，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扩大，封闭型经济开始向开放型经济转变。我国实行对外开放，从广东、福建两省起步，扩展到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4个经济特区。随后，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，以及长江、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。到1986年，共吸收外商投资60~70亿美元，开办了7700多个三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，引进先进技术14000多项，用汇92亿美元，向国外筹借资金余额200亿美元，进出口贸易比改革前增大了近两倍，出口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，从5.6%提高到12%。按照国际通行的概念，出口额加非贸易净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

超过10%，为开放性经济。按上述公式计算，我国1986年已达到12.8%。

8年来，我国改革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：

第一，促进了主层次结构的改善。企业、地方权力的扩大，市场机制的引入，克服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重大比例失调，促进了农轻重，一、二、三产业的协调发展。1986年与1978年相比，在总产值中农业从31.8%下降到30.7%，重工业从39.1%下降到34.4%，而轻工业则从29.1%上升到34.9%。1985年与1980年相比，第一产业从30.8%下降到29.8%，第二产业从48.2%下降到44.5%，而第三产业从21%上升到25.7%。消费品严重匮乏的局面已经改变，除个别商品外，凭票、凭证供应已经取消，煤炭、水泥等生产资料严重短缺也有所缓解。

第二，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。大结构的协调，奠定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。过分集中体制的改变，决策权的分散化，减少了决策失误带来的风险和危害；经济利益的分离和独立，提高了经济的敏感度，为决策的及时调整提供了信号；行政手段干预的减少，财政、金融手段的运用，避免了经济的过度起伏；市场机制的引入，弥补、校正了计划的不足和缺陷。所有这些，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了好的作用，避免了大起大落。1952年到1978年社会总产值年增长，对于平均增长率（7.9%）的最大偏离值，为+24.8%和-41.4%；1979年至1986年期间，对于平均增长率（10.1%）的最大偏离值为+6.4%和-5.5%。

第三，促进了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。结构的改善和经济的稳定增长，为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条件。目前，对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价还没有一个综合指标，从已有的产值利税率、净产值率、可比成本上升率等指标看，改革以来似乎效益是下降的。这

些指标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一定的问题。但由于存在许多不可比因素，如税前还贷增加、利率提高、折旧率上升、农业原料涨价、摊派增多以及结构变动等，不足以反映综合经济效益。体改所数量模型室的王力同志，按全社会的总产出（国民收入）与全社会的总投入（全社会固定资产净值、流动资金占用及劳动者报酬）之比，以1952年不变价计算效益指数为：

1978	1979	1980	1981	1982	1983	1984	1985	1986
0.3411	0.3357	0.3300	0.3222	0.3226	0.3291	0.3455	0.3627	0.3616

从上表可看出，1981年经济调整时效益指标最低，1981年至1985年效益指数是逐年提高的。1986年经济压缩，效益指数有所下降。大体上能反映出改革以来社会经济效益逐步提高的趋势。

第四，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改善，1986年和1978年相比，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24元；扣除价格因素，增长150%以上，平均年增长13.2%；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从316元增加到828元，扣除价格因素，增长80%以上，平均年增长8.4%。同时，8年安排城镇人口就业6000万人，待业率从5.3%下降到2%；农村有7000万农业劳动方向非农业部门转移。10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，开始向小康目标迈进。

## 二、发展与改革中的主要问题

充分肯定改革的成就，同时必须正视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新出现的问题。克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稳定因素，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益，是考虑今后改革的出发点。

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

第一，基础工业滞后，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。随着消费品工业为代表的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，我国工业结构向下游产品倾斜。1985年与1981年相比，工业产值中采掘工业从7.4%下降到5.8%，原料工业从19.7%下降到17.9%，而加工组装业从72.9%上升到76.3%。一般来说，由于加工深化、附加值提高带来的加工业比重增加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趋势，而我国表现为结构失衡：首先，基础工业滞后，“六五”期间的超越系数均为负值，原煤-0.36，原油-0.7，发电量-0.42，成品钢材-0.43，供水-0.02，公路铺设-0.04。其次，加工能力平面过度扩张。一种新产业的生产能力一旦形成，立即以小规模和低效益，遍及全国，同步扩张。1984年我国有电视机生产能力的省27个，洗衣机生产能力的省28个，电冰箱生产能力的省19个。在130家洗衣机组厂中，达到合理批量标准20万台以上的只有14家，仅占18%。再次是依靠进口支撑。“六五”期间，我国大幅度进口原材料，钢材、乙烯、铝、木材、纯碱、烧碱的进口量每年都递增50%以上。

造成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脱节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改革中必然发生的资金分散化带来投资的分散化，另一方面基础工业品价格偏低、加工工业品价格偏高的不合理价格体系没有根本改革，以及未建立起新的聚集资金投资的机制。建一个合理经济规模的电解铝、氧化铝厂最少投资量20亿，而搞铝加工仅几万或几十万投资，在投资分散的情况下自然向投资少、周期短、盈利高的加工业倾斜。这种状况难以为继。适当提高中央集中资金的比重是必要的，但是退回去，重新由中央集中资金、包揽建设，在经济结构远比“一五”时期复杂的今天，是难以成功的。逐步提高基础

工业品的价格，采取股份、债券等新的集资手段吸引地方、企业、居民的资金，加强基础工业是根本的出路。

第二，传统工业滞后，跟不上消费需求的变化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消费需求出现高档化的趋势。这有两种情况，一是过分超前的消费需求是原有的工业技术结构难以支持的。如迅速膨胀起来的个人和社会集团对新兴耐用消费品的需求，即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、录音机、复印机、空调器、小汽车等。1985年与1981年相比，城市居民对新兴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增加了1.7倍；从普及率看，彩电从0.59%提高到18.43%，电冰箱从0.22%提高9.57%，洗衣机从6.54%提高到52.83%。与此同时，社会集团购买进口的空调器增长了18.1倍，复印机12.1倍，放大机56.4倍，录相机3.8倍，小客车9.3倍。这种排浪式的消费扩张，传统工业是难以跟上的。二是传统工业能够满足的合理的消费需求，但由于价格、体制的束缚，不能作出灵活的反应。如手表，一方面普通表大量积压，1986年商业库存达2217万只，工业库存500万只，库存占当年的销售量70%。另一方面高档表、花色表短缺，农村和低龄人的手表市场也有待开拓。手表价格不放开，而由国家调价，企业不能实行灵活的经营战略，难以按不同的消费层次调整产品结构。目前实行全方位的进口和引进来满足消费需求，扩大了国民经济对进口的依赖，而这种进口又不能带动传统工业的改造，相反压抑了传统工业的发展。由传统工业维持的出口支撑不了迅速扩大的进口，必然带来进出口逆差的扩大和外汇的严重不平衡。1978年至1985年进口增长了8.47倍，平均年增仅32.5%，而出口只增长了4.79倍，平均年增长24.6%。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而导致外汇平衡破裂，就不得不大幅度削减进口，造成生产萎缩，而已扩张的需求压不下来，严重通货膨胀就会爆发。南

斯拉夫、匈牙利目前面临的困境，是前车之鉴，值得我们记取。

我国的经济改革，也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

一是改革以来，我们主要采取简政、放权、让利来搞活企业。这对于改变过分集中的传统体制，搞活经济是必要的。现在面临的问题是，如不深化改革，简政、放权、让利已难以进行下去。就让利来说，企业普遍反映发展资金不足，而国家财政连年赤字，居民收入则大幅度上升。1985年与1978年相比，可支配的国民收入中，政府从35%下降到26%，企业从10%下降到7%，而居民则从55%上升到67%。从中可判断：（1）难由国家继续给企业让利；（2）在企业机制未进一步改革、缺乏自我约束的情况下，给企业继续让利，未必用来发展生产，可能成为消费基金新的膨胀因素；（3）企业发展资金不能依靠扩大留利解决，发展金融市场，在运用银行信贷——间接融资渠道以外，开辟直接融资渠道——股票、债券，将消费基金直接转化为企业投资，成为亟待解决的议题了。就放权、简政来说，企业反映权没有放下去，主管部门反映权放不下去，1982年的机构调整与近年来机构改革的试验，收效甚微，原因都在没有市场替代政府的管理职能。不建立资金、物资等要素市场，原有的分配制度取消不了，企业就摆脱不了对行政部门的依附关系，政府也难以转变管理职能、精简管理机构。因此，继续贯彻以搞活企业为中心，必须在改革企业制度、建立要素市场、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等领域深入改革。

二是改革以来，我们比较重视搞活企业，提高微观经济的运行效益，这是在既有的资源配置条件下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方面。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益，使资源的增量与存量符合结构优化的要求，是提高经济整体效益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。我国长期以来

未能实现企业规模效益是突出的一例。我国国内市场广阔，有条件形成合理的批量，以发挥我国的优势和特点。但是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无论国内投资还是进口引进，都没有改变蜂涌而上、遍地开花、规模偏小、效益不高的局面。日本洗衣机厂全国只有15家，我国则有130家；电冰箱产量接近我国的英国，生产厂只有5家，我国却有80多家；南朝鲜电视机厂有6家，其中3家的产量在全国彩电总产量中占93%，而我国的生产厂则有上百家。

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益，实现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，是下一步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
### 三、今后改革的一些设想

为克服经济运行中的障碍和建立新的经济机制，近期内可考虑推进如下改革：

#### 第一，加快住宅改革

国家包住宅的建设和分配，社会购买力集中投向新兴耐用消费品。继彩电、冰箱热后，又掀起了买钢琴热，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严重扭曲。为将超前的消费需求引导到传统产业能够支撑的住宅上来，需要加快住宅商品化改革的步伐。这几年住宅建设加快，不少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，增加了住宅改革的难度。这将造成越拖越难改的局面。

要推进住宅商品化，就要提高房租，相应提高职工工资。据测算，每平米使用面积提到1.50元，按房租占工资总额25%算，需增发300亿工资。由于许多职工住房面积低于平均水平和租住私房等原因，将有120亿元收不回来，这就需要财政和企业拿钱。



如全国城镇按6年分批推进，第一年需支付20亿，可以住宅券代替。只要房租提高到购房比租房合算，推出现有住宅的出售，就能运行得下去。比如一套使用面积为60平米的旧住宅，按每平米200元计价，售价为1.2万元。以每平米1.50元租金，每月需支付90元，每年1200元，大约10年的租金，可购买这套住宅（这里舍去了利息和房产的增值两个因素）。现全国公有住宅19亿平米，按200元计价，售价3800亿元，按出售1/3计，可得1200亿多。如25%居民愿购房，可得300亿元多，第一年出售1/6，即50亿元多。现每年旧住宅暗贴60亿，第一年起步则可减少10亿。再加上每年新建住宅投资250亿，住宅商品化后，也可分批出售。新旧住宅的销售收入构成住宅基金，再投入住宅建设，实现良性循环后，就可减少每年财政与企业对住宅建设的负担，相应抵偿住宅券的支付。第二、第三批住宅商品化推开，住宅券将支付40亿、60亿元，但同时出售新旧住宅的收入也将增加，暗贴减少。随着低于年均水平的职工住房面积的提高，以及工资增加，住宅券将逐步减少和替代。目前，有些城市在住宅改革的试点中，出于减少财政负担的考虑，没有把房租提高的基点放在促进职工购房上。由于新旧住宅出售不了，住宅基金不能实现自我运转而相应减轻财政负担，结果反而财政过不去。因此，就城市来说，房租提高要迈大步，以实现新旧住宅出售；就全国来说，应分批进行，争取6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搞完。

## 第二、坚持价格改革

鉴于群众对近几年的价格改革反应强烈，今后打算控制物价指数3~5%。除需求拉动下物价自然上涨以外，就难以推出价格改革了。